



那年那事



【王慧炯简介】

王慧炯,1925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有着33年电力工程设计、生产管理经验的全面经验。

从1980年开始,历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其亲身实践和辛勤工作,在工程设计与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我6岁的时候,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的和安小学读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日军轰炸南商务印书馆,那天,天空扬起烧焦的纸张,地上铺满燃烧的灰烬。

9岁的时候,我转入上海关路的敬业小学,开始接触西方语言和文化,那时候的上海

时局动荡,家国之殇接踵而至。当我读高二的时候,中法多年的父亲突然离世,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立达学园自行解散。于是我来老师推荐的私立师承中学继续求学,在师承中学一直保持着学业一流,直到1943年的6月高中毕业。

为了凑齐学费,我先是去考了助学金。

凭借着扎实的知识储备,我考取了一项私人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就读当时的南通学院或上海大学。我倾向于去南通学院学技术,但私人奖学金的执行业务要求我入读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被侵略和奴化,上千名学生统一的黑制服、中山裤与汪精卫伪政府一脉相承,我不愿委曲求全,坚决放弃了这项奖学金,转而参加了树恩奖学金的考试。

树恩奖学金是由当时一位上海纺织业的资本家资助的,目的是为给国家培养人才。这项奖学金委托当时的报馆,上海新闻报代考,准备招收50人,不仅资助大学学费,还涵盖生活费与部分生活费。

上海新闻报代考,语文是首要,我当时考了第三名,用文言文写的作文得到了上海新闻报主编的好评,他亲切与我面谈,告诉我获得树恩奖学金。这次奖学金的前3名后来都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记得当时考取这次奖学金的第一名是周寿昌(曾任清华大学计算机与技术系教授)。

有了这笔助学金,我和我的中学好友温鼎勋结伴,一起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交大)。当时的交大在办学结构上,设有工学院、理学院和管理学院这3个学院,工学院下设电机、土木、机械3个专业,理学院下设物

理、化学、数学3个专业,管理学院则下设铁道管理和财务管理专业。

当时考试是5门科目,语文、英文和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记得是考文言文写作,我的语文和英文都考得不错,但是考数理化,尤其是考物理时,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感觉考得一塌糊涂,毫无希望。这次交大的入学考试让我感觉到两难,一是题目之多,题量巨大,比别的学校多出一倍的考卷量,每一大题目下有很多小题目,而小题目也并不小,几乎做不过来;二是题目之难,费力思考也根本解不出来。难怪当时很多人惊叹,交大自设的入学考题简直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

由于考题之难,大家都不及格。交大只好降低录取分数线,工学院分数线降到35、36分,当时工学院各专业录取人数每个系只招30个人,我最后考的大概是十五六名,温鼎勋考了七八名。温鼎勋后来成为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开创者之一。

在那个战乱纷飞的时代,我们都迫切希望改变旧中国落后的局面,早日摆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状态。我深信科学技术与工业可以救国图强,因而下定决心学习工业学科。

1943年9月,我和温鼎勋一同成为了交大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秉承着“求实务实学实业”的交大精神,开启了我们救国图强的求学之旅。

救国图强的求学之路

◆讲述人:王慧炯
记录者:杨奕萍

小学3年级就开始教授英文,也是从那时起,我每天没有断过英文的学习,直到今天。

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淞沪会战爆发,我所读的洋泾中学被日军炮击毁坏,于是我去了立达学园,当时的立达学园是由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巨互生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名作家一起创办的。学校特别聘请当时社会上的精英和有识之士担任老师,先后有朱光潜、丰子恺、叶圣陶、夏衍等一批名师在此任教。

在抗战时期,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非常渺茫。继续读书还是马上工作?是摆在毕业生面前的抉择。诚然理想憧憬如《毕业歌》铿锵高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可是回归现实却仓皇难躲《桃李劫》,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寒门学生阻挡在高昂的学费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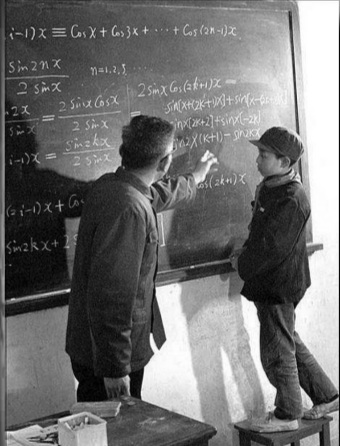
我的高考故事

1977-2017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高考时间推迟到了12月,是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录取比例是29:1,可谓高考史上最难考的一次。



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成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年龄最小、还戴着红领巾的11岁大学生谢彦波在课堂上演示老师出的习题。



2001年7月7日,南京72岁的老人汪侠参加2001年全国高考,创下全国高考年龄最大考生的纪录。这一年全国高考取消了年龄、婚姻限制。



2014年因面颊对歹徒,身负重伤而无缘参加6月高考的江西宜春“夺刀少年”柳艳兵、易政勇,在教育部门单独安排的考场中,进行了属于两个人的特殊高考。

18年前,我走进了考场

◆李开周

18年前,我19岁,平生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时候,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念书,考场设在30公里外的县城中学(以下简称“县中”)。考试前一天,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起了个大早,一块儿搭车去县城。老师已经把准考证发给我们了,上面贴着每个人的照片,照片下面印着考场和考号。到了县城以后,我们先去“认考点”,也就是提前认清考场在哪儿,自己会在哪个教室考试,具体坐在哪个位置,以免第二天走错地方,误了大事。

县中是我们唯一的考场,两个保安守着大门,几乎不怎么检查,我们拿着准考证,进出自如。来“认考点”的考生大部分来自乡镇中学,当然也有县中的学生,他们进出更方便,有的根本不亮准考证,跟保安点点头,就昂首挺胸地进去了,可见管理非常松散。

认完了考点,已经是中午了,我们七八个铁哥们儿在县中对面找了个饭馆,大家凑份子吃了一顿“考前大餐”。当时物价低廉,我们要了六个菜,几碗米线,一大盘煎包,一笼肉包子,总共才花了二十块钱。

吃完这顿饭,大家分头去找住处。县城有亲戚的会去亲戚家借住,否则就去住旅馆。旅馆房费高低不等,最便宜一晚上五块钱,好多人住一大间房,俗称“大通铺”,脏乱嘈杂,影响休息。大多数考生去住两个人一间的招待所,每人每天20元,还可以洗澡。我有一个表姑在县城,本来可以投奔她,可是由于通讯不便,没有提前跟她打招呼,到她家一看,大门紧闭,等到天黑也没人回来。我没办法,又回到县中,去男

生寝室借宿了一晚上。那间寝室住着八个学生,我谁也不认识,一说没地方住,一个睡在门口的学生非常慷慨地让我跟他共睡一张床板。他睡里面,我睡外面,蚊帐遮不住我们俩,被蚊子咬了一身红疙瘩。

第二天考试,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中场休息,碰见了我们的班主任。班主任听说我没有住处,把我领到县中附近粮食局的职工宿舍,找了一间空房,才算真正安顿下来。其实我也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住旅馆,但是父母务农,祖父和祖母都瘫痪在床,家里穷得叮当响,不舍得花这份儿冤枉钱。动身去县城之前,母亲给我蒸了一锅发面饼,装了一大瓶用生姜片腌的咸菜。在县城那几天,我主要靠这些干粮果腹,中间跟同学凑份子吃了一顿所谓“考前大餐”,加上来回车费,还买了10小瓶葡萄糖,总共花了不到20元。之所以买葡萄糖,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相信口服葡萄糖可以提高考试成绩。

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总分642.5分,而那年我们省理科重点分数线是633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填报志愿的政策很不科学,要赶在分数出来之前估分填报,我就读的高中升学率太低,自从建校就没有几个学生考上重点,我和老师都以为能考上普通本科就不错了,所以估分估得很低,最后被省内的一所二流本科院校顺利录取。

好在那所院校对大学新生有一个好政策——军训结束以后,会根据高考成绩发一笔奖学金。我一下子拿到了两千元奖学金,高兴坏了,赶紧寄回老家一千元,让父亲还掉了我入学时借亲戚的债。



眺望着,桥的那一头景色

◆田锦石



知道“高考”这个词,源于我上小学的时候,听父母念叨村里有个念高二的,20多岁了,复读了3年,还没考取。由于离自己太过遥远,我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踢马粪球上。

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村里马路上跟同学们踢风干的马粪球玩,遇见了父亲,当时不知道干什么,父亲突然跟我说了句:“要是考上了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听后有些诧异,愣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踢马粪球去了。若干年后当我真的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一下子买了10个我最爱吃的叉子火烧,而且是夹了灌肠的。

上了初中,每年9月1日开学的时候,学校就会把考上大学的新科上榜学生名单、分数、录取院校张贴在橱窗里以供观赏。橱窗外,我们傻傻地看着,羡慕着。

上了高中,在荷尔蒙的催促下,我们穿着牛仔褲,听着齐秦干嚎《北方的狼》,日日捧着《天龙八部》,还抽空给心仪的女生递纸条。班主任为了让我们拼命学习,画饼充饥地说,如果能考上大学,那就是进了天堂,可以尽情地玩,想跟谁谈恋爱就可以跟谁谈恋爱;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回家修理地球去吧。说得我们将信将疑地只好埋头读书,并偷偷想象着在“天堂”谈恋爱的样子。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座桥到底有多窄?桥的那头“天堂”有多美?

我的学校滦县一中,属于重点中学,大学升学率在唐山地区名列前茅,但多数年份也仅在25%~40%之间。而县里其他中学,几百名高中毕业生中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1990年我高考的那年,学校应届生353人,考上大学的仅91人,剩下的多数留在了学校继续复课,跟下一级学生竞争,结果1991年372名应届生中仅有27人上了大学。落水的只好继续读“高四”,甚至“高五”。

在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局面下,我们只好天天围着高考指挥棒,没日没夜地连轴转。高三上学期就草草结束了高三所有规定课程的学习,下学期一开学,就进入了高考总复

习和题海战术。那半年,整天就是做题、模考,老师填鸭硬灌,我们死记硬背。

有个哥们,课外活动时一边撑着双杠,嘴里一边念念有词,“恍然大悟,悟,明白。”

那时,每个人的辅导书都是五花八门,数量多,品牌杂,各类复习资料、习题集不下几十本,全都摆在课桌上,用简易铁质书架左右一挡,横在面前,占据了半个桌子。

当年我们正赶上全国高考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除了语文和政治还有一部分主观题外,其余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全是客观选择题。因此,我们那时整天就是大量地做选择题,新华书店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所谓“标准化训练”方面的辅导书。所谓辅导书,其实就是题库、题海,从第一页开始就是题,直到最后几页才是答案,而且有些答案还是错的。

很快,那个决定人生命运的“黑色七月”到了。7号,8号,9号,那个七月流火的三天,考了7门课,折磨了7次。

9号下午,我们终于彻底解放了。一下子卸下了千斤重负,身体异常轻盈反而觉得手足无措,没有了方向感。先前发誓要做的烧书一事也忘了。那个下午,大家没有任何欢庆动作和欢呼语言,只是呆呆地坐着,发愣,似乎在回味着什么,似乎在志忑着什么。最后想明白了,书不能烧,要留着复课用。

就这样,我摇摇晃晃如梦游般地从独木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1990年9月,拎着父母给我买的那只猩红的大号皮箱,里裤缝着500元巨款,我坐上火车,离开了家乡,来到两千公里外的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端着领到的脸盆和饭盆,腋下夹着铺盖卷,边向宿舍走,边努力用小眼睛搜寻着老师说的天堂景象。

当初,站在桥的这头,为了过桥而经历的痛苦的日日夜夜,曾刻骨铭心;可到了桥的那头后,愣在那里一度对“天堂”失望、对前途迷茫,这种滋味却也难以忘却。